



略论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

余忠良



江苏人文社会科学讲座

60

辉煌的齐梁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梁文化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三者互相融合,形成了精深悠远的思想体系。佛教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一部分,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佛教文化的本土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和推广者,是中国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者,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他的佛教思想成为齐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研究齐梁文化不能忽视齐梁佛教文化和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

一、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

梁武帝(464年—549年)姓萧名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万绥)人。萧衍少而笃学,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六艺皆精,至于阴阳星相各种学问,无不精通。萧衍即位称帝后,史载他“虽日理万机,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到戊夜”。他不仅是魏晋以来的一位博古通今的皇帝,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帝王。

萧衍的佛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断酒肉文》、《梵网经》、《孝思赋》、《净业赋》及数百卷诸经解义和诏书里。其核心内容是“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真神,即指人的善性)。

萧衍在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认为:“建国君民,立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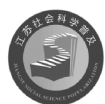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首。”为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他一面大力倡导儒家以维护纲纪,另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他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四次舍身同泰寺,大大提高了佛教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为“三圣”,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视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然后,他在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后,又觉得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因而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定为国教,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道二教为补充的理念体系。萧衍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从而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封建统治。

佛学由于和玄学合流,进而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作为宗教来说,佛教既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适应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又有一套因果报应迷信的教义,可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因而绝大部分上层人物都提倡这种宗教,致使当时佛教大盛。而道教此时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仪式,与佛教并存不废。同时,儒家的礼法观念始终在整个社会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对经学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甚至有时儒学还占据优势。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逐步形成,三教之间互有影响,在思想上也相互有了融合。萧衍的三教同源说,正是这种历史事实在理论上的反映。

萧衍提出“神明佛性说”,特别突出了《涅槃经》所提示的成佛





根基的内在性,以有情众生自身之内的心神作为成佛的正因之体,同时也就把心识视为生命体的根本和标志。萧衍强调心识虽有生灭的异用,但心体神明之性不移,“以其用本不断故,成佛之理皎然”。神明之本体不断,则能知诸法实相之性不灭,有此潜能,终究能够证悟真实佛法而得解脱,在这个意义上,神明是成佛的根基。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和诠释,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特色。佛性说本质上就是对于成佛的原因所作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大涅槃经》主要就是从因果的角度来阐明佛性,尤其在《狮子吼品》中表现得更明显。在梁朝宝亮奉敕编撰的《大涅槃经集解》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竺道生,到僧亮、僧宗,再到宝亮的诸位中国义学高僧,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佛性问题内在的因果联系,因此,他们总是力图从因位、从果位、从因位至果位等方面来说明佛性的意义和作用。

萧衍在佛学上还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与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涅槃学讲人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个佛性是人生成佛的内在根据,《涅槃经》中对佛性有多种解释,都不出佛学的范围。他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立神明成佛义,以不灭的精神实体“神明”作为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即是佛性,由此而成为南方涅槃学重要的一家。吉藏《大乘玄论》、均正《四论玄义》和元晓《涅槃宗要》对此均有记载。

萧衍还积极从事佛教撰述,阐述其独特的佛学观。据史料记载,他曾写过《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最为重要,从而把它单独列出,称之为《三慧经》。他还著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可惜有的著作已失,只能从历史的记载中窥其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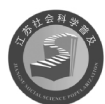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在萧衍所作的《净业赋》的序中,有这样几句话:“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感物外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眷,过常发于外尘,累由于前境;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耳流连于丝竹,眼转移于五色,香气醅起,触鼻发识,舌之受味,甘口啖食;耳之受触,以自安怡。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如是六尘同障善道,方紫夺朱,如风靡草,抱惑而生,与之偕生;随逐无明,莫非烦恼。由是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与德相随,与道为邻,见净业之可爱,以不杀为因;离欲恶而自修,故无障于精神;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内像,内见众疾;既除客尘,反还自性,心清若冰,志洁如雪;结缚既除,忧畏亦灭,与恩爱而常违,顾生死而永别。”萧衍认为神明佛性只是成佛的内在根据,要认识自心佛性,得大涅槃,还要进行自身的修炼。要去欲趋静,按照《礼记》的说法,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要保持至静无动的先天本性,就必须去除欲望动念,“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司,患累无所由生也。”欲念除尽,达到“心清若冰,志洁如雪”的境地,就能返还自性而得解脱。

关于萧衍所主张的神不灭论,以往的研究似乎较少从他自身的佛学和儒家思想背景出发来加以深入考察。而我们如果联系萧衍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就会发现其神不灭论的真实意义在于强调因果理论,并以此在伦理教化方面整合儒释二教,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一方面体现为亲身修佛,以身教影响国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佛教事业。他自己信佛修佛,过着佛教徒的生活,吃素断酒肉,绝房事,恪守佛教戒律。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





为僧,大臣们每次都花大量的钱财把他赎回来。他这样做,既表明了自己向往佛教徒的生活,又可以给佛教强大的经济支持。他对佛教义学很有研究,对《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尤为重视。他还经常召开各种法会,亲自向大家讲经说法,他的讲经会,听众经常成千上万。他在普通六年(525年)于同泰寺开过“千僧会”。中大通元年(529年),他曾开设四部无遮大会(僧、尼及男女居士均可参加,没有限制),参加者有五万余人。中大通三年(531年)十月,他到同泰寺讲《大般涅槃经》。同年十一月,又去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于中大通五年(533年)在同泰寺讲《金字摩诃般若经》时,与会的高僧达上千人。

二、梁武帝萧衍佛教思想的历史地位

萧衍的佛教思想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以佛学思想为宗、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为辅,三者互相渗透,互为补充。他当上皇帝的时候,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教和在东汉时异军突起、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角逐主导地位。

他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萧衍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除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实现了三教并立,更为以后的儒、佛、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后来的两宋理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固然与中外僧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但也





与朝廷的支持有极大的关系。在扶植与支持中国佛教的历代君王之中,萧衍是极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皇帝,又是佛教信徒;既是佛教实践家,也是佛教理论家。他对中国佛教有诸多影响,且声名远播海外。千陀利人(古代东南亚的一个小国)甚至称他为中国的“圣主”,“是我真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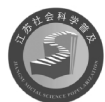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萧衍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鼓吹者、推广者,是中国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者,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

三、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

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正式传入中国后,首先取得帝王的支持和信奉,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萧衍当皇帝的时候,外来的佛教受到正统儒教和传统深厚的道教的顽强抵抗。梁武帝以菩萨皇帝的身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

萧衍是一位佛教理论家,对佛教理论的贡献巨大。他对佛教经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诠释,从理论上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萧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策》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躬制赞、序等凡六百卷。关于佛教的著述前面已经讲到有《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诸经解义共数百卷。其佛学造诣精深,由此可见。

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他调和了佛教内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间的矛盾。他说般若是因,涅槃是果,二者互相依存,不分优劣。经过他这种解释,主张客观万有皆是“空,(非有非无)的般若学和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就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他





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抒情诗似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释佛性,强调内心清明,平时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这便是所谓的“真神佛性”说的主要内容。

综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萧衍最大的贡献是使佛教本土化。他在执政期间,利用皇帝的身份,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把外来的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收录在《广弘明集》中萧衍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土化。在梁朝,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正是萧衍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萧衍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僧人头上留戒疤,推行了佛教的全面素食,也是源于他。萧衍确立的大乘佛教伴侣制度,流传至今,一直被沿用,并对日本、东南亚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佛教历史上,他与印度的阿育王相互辉映。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并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在他执政期间兴盛起来的斋会、水陆道场经久不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程式流传至今。萧衍亲自阅读经藏而协助编修《水陆仪轨》,设水陆大斋,使得冥阳两利,恩泽古今。相传梁武帝的皇后郗氏,性好嫉妒,往生后堕为蟒蛇,痛苦不堪,因而求助于武帝。武帝为超度其夫人郗氏,制作《梁皇宝忏》,请僧礼忏。这部忏法,绵延一千几百年,直至今日仍在唱诵。而现在仍然流传在常州地区民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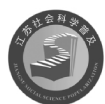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宣卷”(一种佛事),据说也源于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受菩萨戒,有“菩萨皇帝”之称;承受萧衍同时受戒者,有四万八千人,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萧衍常行普同供养,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如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等。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大众讲经,这是历代帝王中前所未有的。他自受菩萨戒后,就严守戒律,断绝房事,不饮酒,不取乐,除宗庙祭祀大会,或其他法事外,他从不举乐。他亲自撰述佛书、提倡译经事业、建造寺塔、讲经法会,乃至舍身、放生、布施等,在位时,寺院增加八百余所,僧尼增加五万多人。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寺院之多的生动写照。《杜阳杂编》云:“梁武帝好佛,造浮图,命萧子云飞白大书曰萧寺。”以至后世多指佛寺为萧寺。萧衍广建寺庙,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南朝佛教文化的兴盛。他在位期间,创建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等著名寺院十余座,其中有为追思父母而建的大智度寺与大爱敬寺。在萧衍故里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万绥)有萧氏家庙多处。萧衍做了皇帝后舍祖宅为寺,建“智宝寺”作为家庙(常州民间又称兰陵寺、万岁寺),后来,又在智宝寺旁建“万岁东岳行宫”,后称东岳庙。“行宫”的级别高于“庙”,它有三大特点:一是门朝东开,象征着紫气东来。二是正方形,显示皇家气派。万岁东岳庙级别甚高,负责管理江南所有的东岳庙、城隍庙和土地庙。三是建有“三老殿”,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在其他庙宇甚为少见。萧衍还在今常州孟城黄山山麓,为他的妻子郗氏修了一座家庙“九龙禅寺”,并在庙中为其母亲张尚柔设立“慈母堂”。虽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在齐梁故里的常州孟城,至今还保留





着万绥(岁)东岳庙和黄山九龙禅寺等寺庙,见证了这段历史。

萧衍崇佛,在齐梁故里的常州地区,千百年来,佛教昌盛,高僧辈出,佛学著作丰盛,寺庙历史悠久,直至民国期间仅在常州城乡还存有大小寺庵 1300 余座。一个地区寺庵的规模和数量,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对当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作用。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余忠良,1955 年生,在乡镇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工作多年,长期担任常州日报社和郊区广播电台的业余通讯员。爱好民间文学,现为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委员,常州市文联委员,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常州市民协民俗委员会秘书长,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州民俗报》副主编,《家谱文化》杂志副主编,《常州民间文艺》民俗文化版编辑,《齐梁文化遗存》编委。

